

乌尔善“封神”之路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

乌尔善

1972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。先后就读中央美术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。执导《刀见笑》《画皮2》《寻龙诀》《封神三部曲》等电影。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。

无论做什么,乌尔善都能让自己有所提升。就拿拍广告来说,他并没把这件事当做纯粹的赚钱手段,“拍广告要不断地学东西,学新技术,看很多片子,激发创意,了解产品特性,了解消费者。比如拍化妆品要跟女孩交流,拍汽车要了解买车人的生活方式。”一部两三天就能拍完的广告片,他往往会准备两三个月,前期反复沟通创意,落实细节,过程更是精益求精。

2004年,乌尔善拍摄了独立电影《肥皂剧》,获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。之后他决定做主流电影,“我入行时已经不算年轻了,因此目标就更明确,只选择我感兴趣的类型和适合我的项目,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。每一部电影我都会全力以赴,只要用心、用力,商业片也能承载思想。”

有人把刊登在《故事会》上的《菜刀传奇》推荐给乌尔善,乌尔善看后觉得基础不错,最终完成了《刀见笑》的剧本。“《菜刀传奇》是一个很小的故事,除了要让故事的层次更丰富以外,还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的架构。”这部电影由三个故事组成,同一把玄铁宝刀,在不同人的手里先后成为“侠客之刀”“厨师之刀”和“屠夫之刀”。三个故事分别表现了夺爱、复仇、上位,呈现“贪嗔痴”的隐喻,并以因果轮回的方式将故事串联起来。

《刀见笑》得到了观众的认可,也让业内人士发现了乌尔善的美学造诣,为他赢得了执导魔幻爱情电影《画皮2》的机会。他果然不负众望,2012年《画皮2》上映,最终斩获7.26亿元票房收入。

随后,乌尔善成立了一家制作公司,借

挖掘出故事中的民族精神 探索电影工业化生产模式

很多中国人自小就知道“封神”的故事,乌尔善也如是,他回忆说:“当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过一套15本的小人书《封神演义》,隔一段时间才出一本,而且还不是按顺序出的,情节不连贯,每次听说出新的了,我都会到新华书店排队去买。”

乌尔善对“封神”评价极高:“与《西游记》相比,《封神演义》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样貌,是真正的国民神话,其中的善恶斗争、英雄成长都具有开创性。这些故事能流传至今,一定有它的道理,不是因为它猎奇,而是因为它永恒,蕴藏着我们对民族精神的自我寻找。”

筹备期间,2014年6月,乌尔善牵头召开了《封神演义》学术研讨会,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研究历史、神话学、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的学者,对《封神演义》原著价值与当代意义做学术评估。第二次策划会则邀请了电影市场、产品营销、玄幻文学、电子游戏等领域的专家和朋友,听取他们对“封神”改编的建议。

乌尔善和编剧团队为“封神”故事设定了全新的视角:不再以姜子牙为核心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,而是把年轻时的姬发推到台前,来展现出一个全新的、正义战胜邪恶的英雄故事。

最终确定以“三部曲”的形式呈现,总片长超过8个小时,如此巨大的体量,更加大了拍摄难度,但乌尔善却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“我喜欢做别人没尝试过的事情,难度越高我就越兴奋。中国电影发展到这个阶段,应该诞生一些宏大的,能够呈现

我们民族文化精髓的作品了。最起码我希望达到这样一种平衡——观众喜欢看,投资人能赚钱,同时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愉悦的精神旅程。”

创作、打磨剧本的同时,乌尔善带领编剧团队、概念艺术家徐天华和四季、特效总监道格拉斯·汉斯·史密斯走访了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地的殷商时期文化遗址和博物馆。影片的整体美学构思,以道教水陆画艺术为基础,融合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宋代山水画的特点。乌尔善对道具的要求是“博物馆级别”,但又不能是博物馆陈列的仿制品,“要从商周青铜器纹样里面提取元素重新组合创作,包括餐具、屏风,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创作,这也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。”开机前,剧组为纣王搭建了一座庞大的龙德殿。先请泥塑师做底稿,再由来自安徽歙县和浙江东阳的数百名木匠手工雕刻、装配,最后贴金、彩绘,单此一项就耗费了3.5万个工时。

乌尔善还与团队一起到新西兰、美国调研,再综合国内各种因素,建立起剧组的工业化执行标准。在场景搭建、场马管理、演员培训、现场拍摄、食堂管理等方面都力求做到有计划、有秩序、有流程、高效率。开机时,剧组的工作人员达到2000人以上,置身现场,就像走进一个高效而严谨的生产车间,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“电影工业化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让新科技进入电影制作的每个环节,以此提升工作效率和安全性。”乌尔善说。

特效总监道格拉斯·汉斯·史密斯参与过《星球大战》的特效制作,凭借《独立日》获得奥斯卡奖最佳视觉效果奖。他与乌尔善在拍《寻龙诀》时便已开始合作。视觉效果则由著名美术师叶锦添掌控。在数字角色制作、大量的战斗与法术场面上,《封神三部曲》攻克了极高的技术难关,将电影工业化推向了更高的标准。

无论工业化程度多高 演员仍是电影的核心

但无论工业化的程度如何,演员仍然是一部电影的核心。在接受采访时乌尔善提起,《封神三部曲》对演员的要求可以说特别严格,“这部电影是典型的大体量、大制作,三部曲连拍,意味着演员要长期在剧组集中,不允许跨戏,所以不敢用太红的演员,大多数角色都采用了新人。”为了让新人尽快挑起大梁,剧组建立了演员训练营,训练课程包括表演、格斗、马术、射箭、驾车、诗书礼乐以及影片分析等。演员们穿的盔甲都在40斤左右,所以必须要达到很强的体能素质。针对不同的角色,还需要个性化的训练,比如饰演妲己的演员娜然,就要专门研究狐狸的生活习性、情感的表达方式。

高强度的训练是为了实现最后的拍摄效果,包括马术动作、格斗动作、威亚动作等,在实际拍摄中都没使用替身。乌尔善对年轻演员们的付出表示肯定,“他们为这部电影投入了生命的力量,非常有潜质,希望通过这次历练,他们在未来能成为中国的超级明星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歌坛偶像费翔出演纣王,也是《封神三部曲》的亮点之一。乌尔善不想把纣王处理成一个刻板的反面角色,而是希望让他表现出真实可信的动机,展示出张力,让观众看到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。费翔除了外形非常符合史书中对纣王的记载之外,在表演和塑造人物方面也提供了很多专业建议,做出了一个明星的表率。

历时十年,乌尔善终于完成了《封神三部曲》,以契合当代文化语境的电影概念、语言、视角和技术,为观众打开了一个中国神话的世界,重新演绎了这段承载国人深厚记忆的传奇。回头再看,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更坚定了:“这个项目是我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无论从电影产业的角度,从传统文化的角度,还是从我个人创作的角度,‘封神’都具有独特的价值。周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,与中国人在现在的精神状态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希望通过《封神三部曲》能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,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”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海报

乌尔善访谈
让观众产生共鸣
是电影成功的标志

记者:“封神”最吸引您的是什么?

乌尔善:首先它是一个好故事,如果故事不能打动人,任何视觉效果都是徒劳的。“封神”脱胎于真实的历史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有《纣王本纪》,记载过一些历史事件。宋代有人写《武王伐纣平话》,把这些故事变成了民间口头文学,增加了狐妖和仙人法术等幻想元素。这也就延伸到《山海经》,比如九尾白狐是《山海经》里讲到的祥瑞之兽。到明代又有了《封神演义》,一直流传下来。其次,“封神”的魅力在于人物的丰富性,有点像奇幻版的《史记》,只不过用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展现出来,暴君英雄,红颜祸水,忠臣奸佞,各种超能力的神仙妖怪……从某种意义上讲,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古典世界的缩影。

记者:《封神三部曲》长达8个小时,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是不是太过庞大了?

乌尔善:2014年我们开始策划这个剧本,邀请专家学者一起研究、讨论,认为完整的故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:第一回到第三十四回,讲纣王无道、黄飞虎归周;第三十五回到第六十六回,兵分三十六路伐西岐;从六十七回到最后一回,姜子牙拜帅、武王伐纣。因为人物众多,故事线纷繁复杂,三部曲可以保持叙事的完整性,当然,每一部都能单独成片,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,也不是同时上映,我们认为这是节省预算的最优方案。

记者:在您看来好剧本的标准是什么?

乌尔善:我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困境就是剧本。其实全世界最卖座、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,90%以上都是古典叙事,都是三幕剧结构。怎么在两个小时的时长之内,把故事用三幕剧的结构讲好,是特别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揣摩的。

记者:谈谈《封神三部曲》剧本创作的过程,有哪些难点?

乌尔善:在编剧冉平老师带领编剧团队进行创作的同时,我们邀请了两位剧本顾问,一位是李安导演的老搭档《卧虎藏龙》和《断背山》的编剧詹姆斯·沙姆斯,另一位是《霸王别姬》和《活着》的编剧芦苇老师。他们在剧本创作的每一个阶段——梗概、大纲、分场、台词本,都提出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。难点在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梳理古代故事,提炼出核心元素,既要通俗,又要让观众感受到古典文化的魅力,产生共鸣。所以我们不断地修改,用了五年时间打磨剧本,前后修改了十几稿。

记者:怎样才能吸引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?

乌尔善:在我看来,神话从来不是过去的、历史的,而是当下的,是一种思维方式。人都会面临各种现实问题,比如友谊、爱情、家庭,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,对其价值的讨论,是主流电影的使命。神话经常被误解为历史、人物传记或者世界观的演绎,但其实神话故事是关于人类心灵的故事。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,讲人的成长,人的命运,人在善恶之间的选择,不仅要让年轻观众产生共鸣,也要让这样一个中国故事被全世界接受。另外我觉得,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把幻想变成现实,观众在电影院里经历一段超现实的旅程之后,会反思现实面对的问题,得出一个精神上的解答。

(图片由上海电影节提供)

往事



永德昌线铺旧址

百年前外乡人到杨柳青商号学徒,打拼开店创业扎根 忆运河边永德昌线铺

望不到头,运河边杨柳青镇上的商铺首尾相连,大庙小庵一座挨着一座,戏楼、书场、茶社、饭馆、客栈应有尽有。一到晚上,各家店铺纷纷亮灯,船上渔火星点点,特别繁华。

杨柳青古街有一家三义成线店,是当地最大的线店,店家从天津城里雇来白线,自己染成各种颜色。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多是从三义成趸线、趸小百货,挑着担子到新疆去售卖。这家店的东家陈建章也是宁津县人,见我父亲一个小孩自己走了几百里路奔这儿找饭辙,动了恻隐之心,收他做了学徒。

要是按照旧时的规矩,学徒想要进师门,先得托人说情,再找两个保人,备办拜师酒席,书写拜师文约。文约的内容大致是:学徒期间,徒弟车碾马踏、投水跳井、悬梁自缢……

总之,任何天灾人祸都由徒弟个人承担,不得师父一字相干;只许师父不教,不许徒弟不学;学徒为期三年,半路不学、有偷盗拐骗等行为,轻者体罚,重者开除,徒家要把这几年的米食折成钱还给师父家。

但人不亲土亲,陈建章看在老乡的份上,只跟我父亲立了字据,没让我父亲摆酒,也没收拜师礼金。进了三义成,我父亲有了落身的地方,还管吃管住,解决了生计问题。

口述 王鸿书 采写 张一然

王鸿书1942年出生在杨柳青一个商户家庭,父亲给他起了“鸿书”这个名字,希望他能多读书,做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如今王鸿书仍然记得,早年杨柳青古镇有七百多家商铺,父亲白手起家经营的永德昌线铺就是其中之一。父亲的人生经历,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昔日大运河岸边、杨柳青古镇的商业场景和生活风貌。

十几岁从山东走到杨柳青

在线店买卖有了容身之地

我父亲叫王静熙,生于1902年,属虎,山东省宁津县杜集镇王家纸房村人。他自幼失去双亲,穷得吃不饱饭,听说运河边杨柳青镇非常繁华,有不少老乡在那边做买卖,应该好找饭辙,于是在他12岁那年,一个人来到了杨柳青。

那时候运河漕运兴盛,船帆一眼

接待顾客。迎客也有规矩,脸要面向门市,不得背向顾客,没人时可以坐着,只要有人踏上台阶,学徒必须先起身接待,让进店里,一泡茶,二装烟,三请坐,满面春风,笑脸相迎。

创业开永德昌线铺
辛苦苦苦挣钱养家

三年出徒后,我父亲又到附近的义顺成布铺当伙计,跟掌柜的刘子恒学买卖。义顺成主要卖绑腿带子。过去到了冬天,人们穿的棉裤脚特别宽,不用腿带子扎紧了,冷风卷起灰土顺着裤脚往里钻,而且走路也不利索,所以无论男女老少,都得用腿带子绑腿脚。

干了几年之后,我父亲自己出来,在河沿大街开了间小线铺,铺号叫“永德昌”。他回老家娶了媳妇儿,生下两个女儿。不幸的是,二女儿夭折,媳妇儿也去世了,所以我父亲就把大女儿带到了杨柳青。又经过几年的发展,线铺扩大经营,在九街西渡口买下临街的两间房屋,前面开店,后面住人。我父亲娶了比自己小十岁的陶家惠,生下我。夫妻俩没日没夜地操劳,逐渐有了些积蓄,又在岳父的帮助下,买下相邻的三间房子,自此独门独院,算是有点商铺买卖家的样子了。

我父亲每隔五六天就去一趟天津卫,到侯家后大胡同市场上货,多为白色棉线、丝线,以及外国进口的染料粉。回杨柳青后,他自己用染料将线染成各种颜色后售卖。

染线这个活又苦又累又麻烦。先得把紧紧缠绕在大线轴上的白线用纺线轮重新绕一遍,变成松松垮垮的一捆,放在水中浸泡,用木棒槌反

复敲打,让线吃透了水,以便染色时能均匀上色。

染线得选晴朗的好天,在院子里支起两口铁锅,一大一小。东边通风的地方放大锅,直径约两米多,染黑线;西边放小锅,染五颜六色的彩线。锅里注入清水,加热升温,倒进染料和硫化氢,用木棍搅拌均匀,把成捆的线放进去,一边煮一边用杆子反复捣。一大锅线得煮一上午,满院子都是硫化氢的味道,特别刺鼻。染好的线从锅里捞出来,晾在横杆上,跟蜡染布差不多。等晾干了之后,再过几遍水,把浮色洗掉,一直洗到水里没有颜色了,才算合格。再用冷盐水浸泡,起到固色的作用。

后面还有更累的活。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,线早就乱了套,得想办法把它捋顺了。院里有一根木头桩子,先把一捆线的一头套在木桩子上,人拿着另一头来回扯,把线扯顺溜了,再用竹竿串上晾起来。等晾干后,再把线套在纺线轮上,绕成一个个小线把,摆在货架上,一把卖一毛钱。

我们家的永德昌线铺都是批发,十包起卖。因为我父亲染线技术扎实,为人厚道,永德昌成了运河周边村落小铺小贩们非常信任的一个批发渠道。

全年只有春节能休息半个月
其余时间都在没日没夜地操劳

那个时候老百姓没钱,裤子褂子穿掉色了舍不得扔,买包染料自己搁家里染染,染完跟新衣服一样。春节前是染料的销售旺季,姑娘家想穿得鲜艳点儿,就自己买白布,因为白布最便宜,再买染料,想穿啥色染啥色。一般来说,染料都是天然的,比如野杜鹃、板栗壳能染出黑色,栀子花、槐花可以染出黄色……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操作工艺。

我父亲看准这个商机,去天津进货,批发来德国和英国进口的大桶染料粉,分装成一个个小纸包。几种染料粉混合在一起,还能变成新颜色,卖一毛钱一包,因为染色简单方便,质量好不掉色,特别畅销。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全家人一起动手分装染料,经常干到夜里两三点钟。

我父亲还会自制梳头油。弄些木刨花,用热水浸泡后就会渗出黏糊糊的液体。我们管这个叫“黏刨花”,姑娘老太太用它梳头。店里也会卖一些肥皂啥的,都是女人常用的东西,因为来买线的大多是女顾客。

每隔五天,我父亲就骑着自行车驮着大包袱,还有四块板子、一个凳子,到武清王庆坨集上摆摊,主要是给当地的小买卖家供货。他也会捎些肥皂、小百货一起卖。听着简单,但路途颠簸,旧社会路上还有劫道的。有一回,我父亲骑到半路,就听说前面有打劫的,赶紧过了大清河,到一个姓纪的熟人家暂避,这才躲过一劫。

在我小的时候,父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母亲除了给父亲帮忙,还得料理家务、洗缝补。他们两个人经常忙到很晚才睡觉,全年只有春节时能休息半个月,其余时间总是没日没夜地操劳。

平津战役时,父亲把我们送往嫁到武清的大姐家避难,他自己留在铺子里看家。解放军的一个通讯班驻扎在我们永德昌线铺,通讯设备全存放在我家。听父亲说,他就负责守着那一大捆一大捆的电话线。1956年公私合营,我父亲把线铺交给国家,他被分配到杨柳青收购站上班。1962年,我父亲患癌症去世。家里丢了顶梁柱,收入大不如前,1968年,我母亲患脑出血病故。回首我父母的一生,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,纯朴的手艺人,靠劳动养家育儿,也给儿女后代做出了榜样。